

一场完美风暴的混乱

作者：雅科夫·阿米德洛尔（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

翻译：李开龙，石雨涵（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概要

中东地区正在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于 1979 年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什叶派势力便活跃起来，现在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中东地区。这场革命使激进的伊斯兰势力死灰复燃并汇集起来，而这些势力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后便一直处于蛰伏状态。激进的伊斯兰有数种形式，均都把伊斯兰教视为解决这一地区问题和改变穆斯林国家在世界羸弱状态的良方，并作为替代现代民族国家世界秩序的更好选择。一百年前，英国和法国根据他们的需求划分中东国家边界，人为地创造了一些国家。而其中一些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其中一些面临崩溃。由于中东之前很长时间是由独裁政权统治的，各种激进的伊斯兰力量被镇压，貌似已经消失，但是现在又再次浮现。在许多地区，家庭、部落、民族团体和宗教再次成为身份和权力的标志，而不是国家。

中东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塑了本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激进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崛起、911 恐怖事件、美国对伊拉克的征服和西亚北非大动荡，这些事件推翻或者削弱了国家，并使阿拉伯民众街头势力增强。关于这些我们必须加上几点，这些事展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弱点，而国际组织也没什么大的作用，每个国家当地武装都是扮演一个摧毁者的角色。结果使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几种不同力量有时冲突，有时互相联手。这也许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之内，是一个选择关于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和道路的争斗。各种不同势力，一方面他们是力求改变现状的，其中一些是无政府主义；另一些反对他们的是对现状的捍卫者。每一方都诉诸于暴力，恐怖主义丛生。而这样的情形目前已经达到了极点，也不知道现状会持续多久、如何结束。

这波历史浪潮，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深度上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任何势力企图以一种积极地方式来影响本地区的内部行为体，会发现这是一项及其艰巨任务。

引言：梦想和毁灭

当今世界正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这一困境在于以何种方法应对以伊斯兰国为主导的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时至今日，这股风暴已经席卷整个中东国家和地区。（这个地区已经从马拉喀什扩张到孟加拉，从大西洋到喜马拉雅山脉）

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在苏联解体后，似乎“历史的终结”已经缓缓到来，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将进入到到一个更民主的未来，并拥有一个开放和全球化的经济，而所有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的“价值观”而塑造出来的。这也颇有理由。此时这些似乎仅仅都是“美国世纪”的继续。而“美国世纪”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彼时美国军队到欧洲拯救了他们。为了从纳粹德国铁蹄下解救了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重返欧洲。为了消灭日本，美军足迹还远至亚洲，达到了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的外围。

在二十世纪，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美国在国际体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二战后，美国在日德两国驻军，并承诺保卫这些区域的和平，发起并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恢复和重建，并帮助日本使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冷战时，美国是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主要力量，派出军队在朝鲜和越南战斗。纵观二十世纪，美国拥有最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在科学技术发展发面，美国做了最大的贡献。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发展现代计算（从

IBM 到苹果)，互联网和 GPS 这些壮举充分表现了美国科技的先进，无论在地球之内还是地球之外都让人难以望其项背。

因此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许多人希望并认为美国将以其世界观来塑造这个新的世界。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不久，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本土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了。从表面看，美国在 9/11 袭击后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乍看起来，人们生活不久就恢复正常了。然而，如果这么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现在比以前对每一个入境的外国人更加感到可疑。当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恐怖袭击的消息时，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证据都异常谨慎。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确保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人身财产安全。简而言之，美国人感到更加不安全了。因此，美国一个电视连续剧里的英雄对他的朋友说，“我们的孩子不会相信，曾经在飞机起飞前两小时，没有人检查我们的行李 45 分钟。”他是正确的。

不过或许更重要的是，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土地上发生的袭击，也改变了许多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变化导致了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局势。奥巴马决定与 IS/ISIL 开战（目前仅限于空袭阶段）的决定意味着，世界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新阶段，虽然奥巴马不愿以这种方式定义它。现实是痛苦的，民主的西方世界正在与激进的逊尼派穆斯林开战，而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 13 年。值得一提的是，从以色列在黎巴嫩遇到激进的什叶派算起，其实以色列已经参与了一个相似的冲突三十余年。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争正在发生美国人称之为“完美风暴（译者：来源于美国一部电影，意为最糟糕的风头浪尖，简单来说倒霉事儿全赶到一块儿）”的背景下。“完美风暴”即就是，将从表面上看不相关的事件分类，这些事件预先并没有协调，但是当它们一起发生时确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比他们单独相加的总和还要大得多。很多时候，很难鉴别出这场风暴的主要组成部分，风暴越大，难度越大。然而，尽管不能完美解构这场风暴，但是如此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局势。所以，我将试图在众多因素中确定的风暴的主要根源。

风暴的源头

风暴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三个相隔甚远的事件，这象征着旧时期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在大约一百年前，故事开始于统治了中东地区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首先，帝国的崩溃意味着穆斯林世界哈里发的结束。当哈里发下台时，没有竞争对手或冒充者打算取而代之，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宣称自己为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因此哈里发不复存在。

第二，土耳其被强行推进现代世界，走上了世俗的道路。这表明了土耳其与过去的决裂。废除哈里发（这个头衔已经没有太多实际作用）是伊斯兰失去在世界领导角色的一个重要事件。伊斯兰衰微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的结果，而是源于西方的权力的增长，以及其西方的价值观主导了世界事务和各地的话语权。就这样，伊斯兰教失去了在构建世界过程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的希望。即使在全球经济变得依赖能源，而能源主要存在于穆斯林国家之时，穆斯林国家的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穆斯林群众和他们的领导人的情绪也受到了这些令人心塞的事件的影响产生了挫败感。在奥萨马·本·拉登早期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了这个痛苦的日子—哈里发被废除，而在西方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第三件事则是一战后英法根据自身需要和利益重新划分原属于土耳其的中东政治版图，而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高级官员（英国代表 M. 赛克斯和法国代表 G. 皮科）把该地区划分为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名在很多地区属于很新鲜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考虑到自然边界、部落和少数民族的分布，有时人为地连接在一起，有时残酷地分开。一个贝都因部落被分为两个国家，有些国家是由敌对双方凑在一起，这让人非常气愤。

自此之后，中东地区经历了 95 年的风风雨雨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这个时期里大多数国家由两类独裁者统治：一种是王室统治，有好有坏，他们把国家看成私人财产；另一种统治者则是依靠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忠诚。几乎与此同时，大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年之后，穆斯林兄弟会成立。其口号是“伊斯兰就是答案”，象征着其雄心壮志，而穆兄会的伟大抱负正是在在独裁政权体制内滋养出来的。尽管这些独裁政权的宪法引用了伊斯兰教法，但是采取什么决策都不是那些忠于伊斯兰教的人所决定的，而是那些忠心于独裁者的人。中东地区被控制在保守主义的铁钳之中，控制的松紧程度根据统治者的特点和政权有所不同，但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要么国王被官僚取而代之，要么新的独裁者取代旧人。然而，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一股强劲的力量一直在蛰伏。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当年阿亚图拉霍梅尼成功地推翻了国王的政权，建立一个以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权。这一事件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什叶派逆转了他们在穆斯林世界低人一等的地位。什叶派只占人口的 15%，而大多数是逊尼派。第二个信息更为重要，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表明：即便是逊尼派也可根据伊斯兰教法来建立国家，并由神职人员管理。

伊朗人利用伊斯兰革命扩展了什叶派在中东的利益。但是其输出革命的行为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满，甚至是某些国家的动荡。毫无疑问，伊朗的行为唤醒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国家内休眠的力量，他们开始注意什叶派的崛起。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力量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执政地位。作为伊朗改变中东的努力之一，伊朗帮助什叶派的真主党和逊尼派的哈马斯施行恐怖活动。他们把恐怖主义带到穆斯林世界，并使之转化成合法的武器，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行动很成功。（他们其实不是第一个。阿拉法特使用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取得了成功，然而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我认为，正是巴勒斯坦在世界各地成功的行动大规模地把恐怖主义带到了现代穆斯林世界，从 1970 年代开始。）

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激进伊斯兰潮开始，什叶派就保持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一旦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最近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宣称，在近几个世纪，这是伊朗第一次在四个阿拉伯什叶派盟友国内拥有决定性影响（巴格达，大马士革，萨那和贝鲁特）。他还补充说，这其实不是伊朗计划好的。伊朗急于控制周边地区，然后是中东阿拉伯地区，而这些愿望的实现有赖于伊朗的核武器。一旦成功这将为伊朗提供绝对的安全。拥有了核保护伞之后伊朗便可以实现被压制多年的梦想。伊朗邻国绝大多数是逊尼派，他们深知这一点因此恐惧伊朗什叶派的威胁，尤其是核弹。在此时想要理解中东问题是不能不考虑什叶派和逊尼派数百年来恩怨极深的教派矛盾，但是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什叶派力量迅速增强。无论在中东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竞争都仍将会继续下去。

最近发生在也门的事件可以充分表现二者争的争斗。也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南部，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贫困的邻居。在也门，什叶派部落武装力量与被废黜总统（“阿拉伯之春”的受害者）汇合，他们合力一起占领了首都萨那。沙特自认为是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密切地注视着伊朗的盟友也门。伊朗支持的也门武装收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武器，控制了也门，创建了伊朗的一个可以威胁沙特的支点。经过再三犹豫之后，沙特新国王决定出兵来应对什叶派的挑战。沙特的逊尼派联盟开始轰炸胡塞武装并且准备出兵入侵。现在局势已经变得非常明了，只有出动地面部队才能挽救当地的局势。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联盟想要维持也门局势，而这个联盟包括阿联酋、约旦、摩洛哥，还有最为重要的埃及。而每个国家都只贡献了很小的兵力（巴基斯坦则拒绝协助，且没有国家派出地面部队）。然而，这是沙特创建的一个对付日渐壮大的什叶派势力的重要框架，这也是已经进行了超过千年的教派斗争的现代版。

来自伊斯兰革命的第二个教训是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当然包括逊尼派，明白他们接管国家和以伊斯兰教来治国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梦想。如果这个梦想可以在德黑兰实现，那么也可以在开罗和利雅得实现。不论它们之间的差别，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都明白一个新的现实，就是“伊斯兰就是最终方案”，就在现在就在中东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光明的未来。

第二个影响中东的伊斯兰化进程的事件更加复杂，包括几个阶段。它开始于激进的逊尼派在阿富汗与苏联的 10 年对抗，从 1979 到 1989 年。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世俗国家，在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从阿富汗的逊尼派看来，是他们造成了几年后苏联的崩溃。塔利班确实成功并且获得了来自美国的大笔援助。他们将战争视为给苏联造成损失的良机。塔利班方面利用其与苏联战斗的成功证明了激进的逊尼伊斯兰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伊斯兰力量第一次与现代的、世俗的欧洲力量对抗成功后，问题在于：现在怎么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富汗人的成功导致一个逊尼教徒的觉醒，本·拉登在沙特阿拉伯创建了基地组织，后来其转移到阿富汗，并把斗争方向对准到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多年来，沙特阿拉伯向外宣传以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为基础的伊斯兰激进思想，他的支持者都是阿拉伯半岛上给予沙特王室合法统治认可的伙伴。奥萨马·本·拉登出生于也门，但在狂热瓦哈比分子集中地长大和接受教育。后来开始相信与沙特王室的他们合作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加入那些曾经击败了苏联的武装力量，为了继续消灭剩下的超级大国，美国。

根据本·拉登所言，在西方强国所塑造的世界中，伊斯兰教已经被推到历史的边缘，影响微乎其微。他根据世界革命理论，认为美国是其主要敌人，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拉登及其追随者不仅对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厌恶，还有西方文化，因为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世界观来看，西方的一切威胁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世界影响衰微和厌恶西方文化的结合成了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行动最初的思想来源，对于其他原教旨主义组织也是一样的，对于 IS 尤甚。

最明显的可以表达由本拉登领导的逊尼派与美国的斗争就是 9/11 袭击。在这个巨大的灾难发生后，美国宣布对逊尼派恐怖主义开战并且准备发兵。接着入侵了阿富汗，而阿富汗同时也是基地组织的据点，后来征服了伊拉克。美国虽然占领了阿富汗但问题是数年后又撤军，基本对中东没有太大的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则很成功。中东阿拉伯的中心从肥沃的新月地带，延伸到了尼罗河沿岸的埃及，伊拉克处在其中中心位置。美国在伊拉克做什么？它剔除了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最有影响力的统治者，开创了一个清算暴君的先例，公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且留下了无尽的血迹。因此战争的形成导致了伊拉克的分崩离析，煽动了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一方反对另一方，并导致政府权利真空的出现：从伊拉克西北部到巴格达的大片广阔区域缺乏有效管理。没有适当的政府管控就会无形中招致破坏政府稳定的势力。伊拉克，它根本不可能回到美国入侵前的那个国家状态。

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对抗世界超级大国战争的结果一直很鼓舞人心：抵抗苏联入侵的成功并对美国造成重创，这使其未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现和平与稳定。最后，超级大国被人们从伊斯兰的土地上赶了出去，使人们感到强有力而重大的成就感。看来想强行改变伊斯兰世界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例如，对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进行的改变则很成功。如果国家试图强行改变现状却没有意愿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并且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根本不可能实现。根据伊斯兰极端势力分子的世界观，他们不会轻言放弃自己的梦想，并且能够在与西方对抗的漫长而筋疲力竭的战斗中坚持他们的立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通过各种办法成功地达到西方国家的首都，并在那里采取行动对抗敌人。

各种激进主义运动的合流使其势力增加并获得了力量和信心，世界大国(美国作为他们的领袖)表现出了应对激进分子的愚笨无能，作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他们的行为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并将持续如此。除非在一长串的失败后发生激变，否则，没有人会打击激进分子的信心，他们还会坚定地认为真主会保佑他们获胜。他们会认为失败只是通往伟大胜利道路的基石。他们正努力改变伊斯兰教处于世界边缘的这种境况，他们明白这场战斗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世界观教导要耐心和坚定不移的斗争，而这些斗争有时看起来似乎是毫无希望而又残酷的，耐心和坚定不移是斗争的关键部分，而这些正是他们优于敌

人即西方的一点。因此，激进分子看待时间的方式以及他们为实现的目标而设置的时间表，都使他们有别于西方。西方政治文化通常是急于求成，跟据需要制作收益和损失的季度报告，还有依据需要每隔几年改选。

第三个对中东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事件就是“西亚北非大动荡”。这个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摧毁了一战后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大部分地区的领土安排。这为黑暗和强大的力量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而其中一些此前被他们国家的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压制。家庭、部落、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再次成为吸引力和忠诚的核心，取代了自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以国家为核心的概念。在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是这个群体中最突出的国家)旧有的政治体制完全消失了，而正是旧体制对本国公民施加影响并阻止过黑暗激进力量的释放。在其他国家，统治者受到了威胁，国内压力引发了更多的革命(黎巴嫩，巴林，约旦在受到内部威胁的国家中居于前列)。即使有些国家看起来是稳定的，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但他们都将不得不对非常困难的挑战。该地区的每一个政府都仍然保持独裁专制(也许除了突尼斯和土耳其)，但每个国家必须注意国内压力和群众的情绪，并将他们考虑到在决策制定的内容中。即使是在拥有完整政治框架和在国内维持高压统治的国家，街头舆论已经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力，甚至有人建议称之为“通向天堂之路”。

2010年起的街头抗议引发暴乱，从突尼斯到叙利亚，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问题和环境，但是这些都是由于该地区政权的特点这一内部因素造成的。因为一名科威特学者告诉我，“西亚北非大动荡”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阿拉伯国家公民的“尊严”遭到了损害。这个通用术语，“尊严”是指每个国家的集权统治者都忘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曾经对国家所有公民的承诺，而不仅仅是那些与他有关的承诺(意指损公肥私)。独裁政权的表现令人失望，但这些政权领导却格外关照他们的亲信。“阿拉伯之春”在每个国家的爆发完全是由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与外部影响几乎没有关系。有趣的是，该地区的王国——无论是富裕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或是贫穷的像约旦和摩洛哥——统治精英仍然几乎完全没有受损。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皇家统治者在国内享有的合法性，而这应归因于文化和宗教相符。

“西亚北非大动荡”以及中东地区世界观伊斯兰化的增强，是一个关于居住该地区的身份和群体的斗争的一部分。所有事件的爆发的都是在对教义与方法和信仰缺失的背景下发生的，并受到来自欧洲文化的世界观的影响。

欧洲引发了决定中东从十八世纪末以来的各种运动的发展进程，从拿破仑征服埃及(1798)，到独裁者的崛起，他们大多数都是军事首领，注定要在中东核心地区的许多国家统治几十年，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拉克。如上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区划分成国家是欧洲强加的，并且按照外国列强的需要，而不考虑历史联系或社会、地理环境等有关因素。因此四个独立的选举活动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转向另一种合法性的来源，那就是伊斯兰教。巴勒斯坦和埃及、土耳其和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和具有相似观点的代表被大多数人完全自愿地选出来。大多数选民认为，伊斯兰教是人类、穆斯林以及国家所面临难题时的答案。在该地区不同的地方的成功表明选择激进的政治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小概率的事件，这一过程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事实是，投票支持激进主义体现在中东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土耳其和埃及，其中一个不是阿拉伯国家)，和在国内受欧洲影响力十分强大和长久的国家(突尼斯)，甚至是巴勒斯坦人，这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土耳其发生的变革，结束了人们对于土耳其世俗化努力的印象，即把一个穆斯林国家和社会变成一个公民都是穆斯林的世俗国家。这一尝试是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开始的，几乎是在近一百年前，未能抵挡住靠近欧洲的中东国家植根于伊斯兰教的文化和力量。(而在土耳其最近的2015年6月选举结果表明伊斯兰政党的力量正在被削弱，很明显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而且它的发展趋势也尚不明确)埃及的将军们明白，也许是因为土耳其的经验，

如果他们没能快速阻止这一过程，那么他们将会失去他们改变现状的地位和能力，因此需要进行反革命和推翻穆尔西。然而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是最强大的平民力量；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 54% 的选票，而萨拉菲主义运动则只赢得了 24% 的选票。突尼斯世俗政府当选后又进行了额外调整，这也许是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

20 多年前(当我还是以以色列军事情报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时)，我被已故的拉宾总理问到为什么我认为伊斯兰主义很危险，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伊斯兰主义的生命力很顽强，相对于其他的教义，比如纳赛尔主义、复兴党主义以及泛阿拉伯主义，这些拉宾都非常熟悉而且已经接触了许多年。我的回答是，伊斯兰主义作为一个由下而上政治力量，是从该地区的居民的真实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力量，不同于从精英输入到该地区的并强加给社会的不同阶层的其他世界观。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已经证明了这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中看到西方世界对“西亚北非大动荡”的作为。西方国家清除了利比亚疯狂的、臭名昭著并且几乎没有能力伤害到除他本国之外国家的领导人。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利比亚的分崩离析，而它曾是一个运作正常的国度，一个自古以来部落竞争对手之间进行无休止战争的国度，而现在利比亚转换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武器市场。如今，“该国”的武器出口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各个国家，供当地激进分子使用，出口到埃及，供内部使用，出口到西奈半岛，供半岛和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使用。这是利比亚在这次革命后对整个人类、特别是中东的主要“贡献”。

外部世界的消极贡献还体现在：它不愿意使用武力阻止伊朗对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为代表的势力进行支持，或在叛乱的初始阶段帮助叙利亚温和派。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愿意帮助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来对抗伊斯兰国的士兵。因此，叙利亚反对派和与伊拉克接壤地区的极端主义分子实力增强，并继续(相互)战斗和杀戮。伊斯兰国势头很猛的基础是：它步入了由懦弱的伊拉克政权创建的缺口，而且随着美国军队的撤离，巴格达什叶派政府开始驱逐逊尼派教徒。除此之外，从叙利亚边境(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来看，阿萨德在叙利亚东北地区失去了控制权而且无能的叙利亚反对派统一成了一个真正的权力实体来控制这些地区。世界各国毫无办法，而在叙利亚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已经被杀害，而且难民的数量已达到近一千万，现在难民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叙利亚以外的恶劣环境中。当然，我们无法弄明白或评估，如何阻止伊朗的援助或增加对少数激进反对派的支持来改变地面局势，但很明显，由外部世界的无能为力引发的权力真空，使得伊斯兰国的出现和发展成为可能。

对中东来说最幸运的是，外国势力努力防止或阻止埃及军队的反革命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努力成功而且穆斯林兄弟持续统治埃及，那么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力量就会成倍增加。穆斯林兄弟会持续统治埃及并将会增加其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这将会削弱现存的约旦政权(也许是达到推翻的地步)，鼓励土耳其加大其在中东的核心地区的参与的力度，通过给阿拉伯世界激进势力提供援助，甚至使突尼斯的穆斯林兄弟会抵制强加于他们的民主进程。埃及的问题是长期的，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也很难被军人解决。然而，他们领导的政变推动了整个地区反激进主义力量的发展，并创建了另外一种不同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处理方式的方式。

一个额外的因素必须包含在这些重大事件之中，这一因素尽管不很重要但仍有些意义，主要是因为中东街头舆论影响力的增强。我指的是卡塔尔。它是一个拥有无穷无尽资金的波斯湾小国，它曾经是用来维护和强化恐怖组织的地方，例如，加沙的哈马斯，叙利亚的某些反对派，以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由卡塔尔赞助的媒体网络——半岛电视台的帮助下，该国尽其所能动摇不和本国穆斯林兄弟会合作的温和政权。半岛电视台充分利用街头越来越大的舆论影响力，成功的动摇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但他们对于将来社会的稳定没有任何贡献。随着互联网革命的发展，阿拉伯社会逐渐展示于媒体之中，这都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因素，但是媒体对阿拉伯街头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推动骚乱，而这正是卡塔尔所为。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富裕的海湾国家已经采取行动或正在采取行动以减少卡塔尔的影响力，但是它对该地区的稳定的损坏很难消除。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特别是西方在“西亚北非大动荡”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外部力量没有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不作为而导致这些事件的发生或造成其惨淡的结果。在利比亚，外部力量的作用是有害的。在叙利亚，外部力量并没有阻止负面印象的出现，即使或许，它有可能阻止的。在埃及，外部力量可能加速了“阿拉伯之春”事件的展开。“阿拉伯之春”的展开可能是由于阿拉伯社会面临着全方位的困境，阿拉伯统治者背弃了他们的责任与义务，甚至对他们的人民进行独裁统治。外面的世界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丝内疚。

15年前，我从一位埃及高级官员那听到对中东弊病的诊断。谈话是关于整个地区的，他声称，中东地区只有四个“真正的国家”：埃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当我表示惊讶问在他的清单上怎么没有除埃及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他回答说：“这些都不是国家，而是有国旗的一个家庭。”这种分类诊断也许是不确切而且笼统的，却很好的解释了“阿拉伯之春”的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如今的中东是一个人造的世界，如上所述，为了满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需求。

总之，在哲学层面上，当前被描述的有关穆斯林世界关于如何应对现代化的问题斗争，是国家的核心。这是伊斯兰教内部冲突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激进的伊斯兰对抗整个世界的本质。伊斯兰教没有经历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所经历的革命，也没有经历犹太教的演变。在穆斯林世界，宗教、国家以及个人生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已经成为了阻碍伊斯兰共同体应对现代世界的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他们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原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质是：它渴望，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以先知穆罕默德那个世纪的方式进行生活，没有任何重大的更新。这种途径具有危险和残酷的一面，尤其是当这场运动人们从思想到行动都非常的提倡它，毫无妥协的去容忍，而且没有灵活性的时候。当审视这些反对他们的对手和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的斗争运动时，我们就会看到事态的严重性。其结果就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除了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西方侵略者以及以色列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外，伊斯兰激进运动杀害了比死去的非穆斯林更多的穆斯林同胞——比如什叶派和逊尼派他们自己，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管按照哪种标准来说都对宗教非常虔诚。狂热和残忍的结合造成了整个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逊尼派可怕、血腥的杀戮。宗教狂热主义与感觉世界不公的结合，并没有表现出激进分子的行为是为了伊斯兰教的利益或是与宗教意识形态相符合，而是斗争更加猛烈和残忍。

全球框架

四种全球现象增强了“阿拉伯之春”事件随之以来的中东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些原因，如上所述，主要存在于该地区的内部进程中。

1. 缺乏一个国际仲裁者——现如今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作为高效的仲裁员，或调停者，并极力号召人们去规范那些破坏或干预他们的邻国，这些“流氓国家”曾提供经费给恐怖主义者开展恐怖活动，或杀死他们国家的公民，（伊朗、北苏丹、朝鲜和叙利亚是名单上最主要的国家，但并不是唯一的国家）。人们对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二战后寄予的众多厚望却已经破产了。它的破产是明显的，无论是在行动领域——因为在联合国最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世界大国相互保持中立；还是在道德领域——因为联合国大会是在自动的多获得票数的基础上运作的，它并不关注国际社会的真实需要。既然每个国家在联合国都有投票的权利，有组织的团体几乎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他们所请求的任何决议，而且这 57 个穆斯林国家（几乎一半的不结盟运动国家）构成了联合国中最大的同质群体。那么，鉴于当前的联合国的组织构成，难怪它通过了奇怪的决议而且这些决议与中东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相关。当伊朗和苏丹是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大约一半的决议的目的是反对以色列），伊朗是核不扩散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时，他们预期从联合国中成就伟大事业，而联合国却成为了一个侮辱其创始国的荒谬和滑稽的作品。

苏联解体后，世界似乎将会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产生强大的而有效的国际契约，它们基于新旧信仰，或作为超级大国争霸结束后的一个自然发展，阻塞冷战期间的所有进展。然而，恰恰

相反的是这些积极的进展一个都没有实现。甚至在海牙国际法庭，如人权委员会面临着被“劫持”的边缘以满足巴勒斯坦人打击以色列的需要，如果巴勒斯坦人成功，那么国际法庭也将不再是一个权威的机构并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2. 美国的撤军——美国正试图将其义务减少到与其盟友大体相当的程度，尤其是在中东地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不再准备为了保护“美式和平”而付出必要代价。的确，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其他大国力量增加(主要是中国)或试图保护他们的权力(比如俄罗斯)，但美国厌倦了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即使它无人能替代。此外，随着美国自身在国际上的实力下降以及在 2008 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其经济受损，美国的认知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点在决定美国与中东地区的国家如何相处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自 2015 年初以来已经向好的方向改变了)。

美国在其盟友(例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遭遇困境时抛弃并忽视他们的举动已经让他的盟友们感到失望并让美国的手们感到惊讶。美国政府没有等到建立成熟的伊拉克军队而在早期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以及没有留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应对塔利班而从阿富汗撤离的行动，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美国没有对阿萨德政权在悍然越过红线(一条由美国总统本人画的红线)使用化学武器后进行攻击，这一事实产生了相似的负面影响，一些中东国家认为在与伊朗的谈判中美国采取了“默认的”立场。实际上，美国人排除了选择采用军事行动作为一种手段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能力，这一事实决定着许多中东观察家衡量美国对整个地区的承诺，以及防止对其盟友(存在)造成危险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客观上并没有被削弱，但它已经失去了大量采取行动的决心，这仍然是重要的，因此它作为地区决策者已经失去了极大的信任与声望。

3. 国际主义的衰落——当今世界没有其他崛起的大国，没有国家会越来越强大，甚至准备发挥一小部分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所付出的努力。没有一个新兴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强国觉得其自身具有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这样就激励了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断向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领袖准备为了“世界价值观”而牺牲他或她的军队。他们全都追求纯粹的国内政策，只考虑他们统治的国家的需要。一个实力日渐强大的国家的高级官员告诉我：我们有责任对一件事负责，那就是我们的公民应该有足够的能量在冬天保暖。因此，他解释说，我们的国家将不会全面实施对伊朗在石油领域的制裁。

4. 欧洲影响力的消散——欧洲已经从中东(也许从全球)的制衡局面消失了。它没有能力、意志，或政治结构能够作出决定并实施。因此，尽管其地理位置接近中东，但是它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影响力。欧盟中的某些国家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因为欧盟是一个政治实体，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军事力量，这使得他们在危机时期处在影响圈外，例如在面临目前的中东这一问题上。英国议会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2013 年 8 月利用化学武器针对本国平民的时间发生后，投票否决对阿萨德使用武力的那天，就象征着未来欧洲将不再对中东事务产生真正的影响力。欧洲作为西方国家中最大的民主联盟的领导者以及一些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其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因此它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影响，让其认为自己是民主阵营的一员，但这只是一个特例而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或者中东地区的运动。

除此之外，有实事认为：美国的目标是实现能源独立。目前还很难评估由此产生的变化将会如何影响中东地区。该地区对亚洲和欧洲来说仍然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源，但美国已经不再那么依赖中东地区了。此外，当今市场上石油供应饱和，如果美国决定出口天然气，它将会大量供给任何想要天然气的人。现今是一个能源价格下跌，富有的中东国家现金收入正在下降的市场。这种新形势可能会分散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注意力，尤其是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供应商。很明显，中东地区石油国家动员美国的能力将会下降，同时他们将会在外交政策行为上投入大量资金。例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资助大量金钱给埃及以使其脱离穆斯林兄弟会的掌控。同样的伊朗对黎巴嫩和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投资也是如此。能源

市场发生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对世界和地区产生影响，鉴于到能源市场对地区的一些主要大国具有重大影响，所以要非常谨慎地密切关注他们。

很显然，即使美国能成为能源独立的国家，它仍有兴趣与富裕的海湾国家保持其特殊的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海湾国家是重要的武器买家，他们采购数量巨大足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另一个原因是，面对他的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美国不愿失去它在世界中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来源。事实上，沙特阿拉伯自 2014 年底以来就已经陷入经济战，包括大幅降低石油的价格。目的是为了淘汰以美国为首的生产石油价格较高的国家，以保住沙特阿拉伯未来在石油市场的份额。这是一场维持沙特王国重要地位以及整个中东地区能源市场的斗争。这场斗争结束之后，情况将变得更清晰，我们将能更好地评估新的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和市场变化的影响。

如上所述，中东地区的内部动荡恰逢外部力量的缺失——无论是一个超级大国或国际力量——想要平息或停止中东的乱局，却适得其反。

车轮是否可逆转？

局势是否在掌控之中，就像奥巴马总统 2014 年 9 月 10 日宣布，要摧毁伊斯兰国或改变中东事务的进程？往小了说是打击 IS，往大了说还是阻止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以我的估计，答案是很难的。

美国若没有进行更大的投入，那么它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将不可能取得成功。奥巴马总统宣布为了实现“摧毁伊斯兰国”的目标，他需要部署大量的地面部队。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库尔德人和其他与伊斯兰国军队作战的人。目前，伊斯兰国的军队沉醉于胜利中并一如既往的嗜杀成性。虽然有望在库尔德武装力量和伊拉克军队的基础上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反伊斯兰国的军事力量，但很明显在叙利亚没有这样的基础。此外，那些赞成在科索沃战争中动用空军的因素，甚至还有在加沙的战役中的这些因素，这些因素都很难再起作用。伊斯兰国的领导人感到他们只对自己和他们在战场上战斗的人存在义务。现阶段，这是唯一的“共同体”，他们的命运对这些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因此，只要他们的人没有被摧毁，别人就没有办法伤害任何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对于伊斯兰国的处境因此完全不同于当人们对抗一个国家的军队时内心感到对其国内的公民有着某种程度的义务的处境，甚至不同于与哈马斯作战，虽然对其公民的义务很小却仍然是存在的。与伊斯兰国的斗争代表的是一种“灭绝性”的战争。21 世纪的先进技术必须应对在过去战争中所呈现的同样的挑战：杀死对方的士兵。如上所述，在这样的战争只有通过部署具有真实能力的地面部队才有可能成功。伊拉克没有这样的军事力量，可能除了库尔德人，而在叙利亚肯定也没有。（是否需要一个高水平的情报机构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来实现对敌人的空中打击，以及良好的情报机构通过何种途径为空军获得情报，这些专业问题需要进行单独讨论。）

对整个中东地区关于激进伊斯兰主义的议题，美国及其盟友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努力可以比喻为往密西西比河投掷石块以希望改变其水流路线。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浪潮是一个历史性的浪潮，它与穆斯林世界几十年发展和穆斯林世界的角色和身份斗争相关联。如上所述，危机的种子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而播种下来的，一个世纪以前，自 1979 年以来这场危机就在不断的聚集能量，也就是说，已经超过 35 年的历史了。对这场汹涌的浪潮施加任何影响是及其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美国。这一危机波及的地理范围太广泛，而且它的宗教和文化根基太深厚。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必要识别并专注于当前伊斯兰主义最泛滥最危险地方，以避免发生更大的灾难。也可以争论哪一个是更大的危险：一方面，伊斯兰国最近取得的成功并在广阔的领土进行的残酷控制；另一方面是叙利亚正在进行的屠杀，有 250000 叙利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由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手下屠杀的。我们决不应该轻视伊斯兰国信徒们的残忍行为，也不是整个群体的灭绝，遭破坏的仅仅因为他们不是穆斯林。（顺便说一句，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的基督徒正在消失，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演进，它与日益增长的激进的伊斯

兰运动同时发生。由于环境压力，基督徒正在从一些地方离去，比如伯利恒，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但如果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例如像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他们被迫选择流亡或死亡）然而，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谁通过他们残忍行为引起了更多的负面情绪，而是谁更危险和谁对未来的世界产生更重要的后果。毫无疑问在我的脑海里，以任何标准来说，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比伊斯兰国或叙利亚具有更大的威胁。

伊朗在中东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年变得更加重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不仅是第一个向今天的中东发送政治冲击波的国家，而且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提早准备输出军队和资金以扩张其利益。伊朗人还表示，他们知道如何利用穆斯林/阿拉伯和国际体系的弱点。尽管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大体上相互竞争，同时波斯人和伊拉克什叶派竞争也颇为激烈，但伊朗人能够在各种重大焦点问题上获得很大的影响，在各个区域的什叶派共同体的协助下——也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甚至加沙，而加沙甚至没有什叶派教徒。看来，伊朗也感觉到了美国的弱点，它担忧卷入事件后就要担负起在该地区诉诸于武力的责任。意识到这一点后，伊朗最近忙于试图让美国作为一个新“伙伴”参与进来，通过渲染其自身的能力帮助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这是伊朗的能力和意愿的另一个例子，当感知到不同环境下的弱点时，就进行投资和建立联系，目的是获得影响力。

然而，伊朗人并不满足于仅仅拥有这些功能。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超级大国，至少是一个地区性的超级大国，而且拥有扩展到地区以外的宗教使命。这是他们想要获取核武器的原因。掌控在德黑兰什叶派手中的这种武器将会威胁到整个地区并成为加速核军备竞赛的依据。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更多逊尼派国家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拥有核弹。例如，沙特阿拉伯已经宣布如果伊朗拥有核能力他们也将获取核能力，埃及人也暗示到这一点，土耳其代表对美国国会议员的员工也这样说。一旦各种逊尼派国家获得核武器，用不了多久恐怖组织也会获得核武器。中东地区的有核国家将会终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这一条约是国际制度中与防止核武器扩散有关的些许成就之一。

甚至在这之前，如果中东发现自己处于伊朗核保护伞下，那么该地区将成为恐怖组织使用常规武器的天堂。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在一个潜在发生核冲突的环境中世界各国不敢采取行动反对他们。整个地区将会陷入更深的暴力漩涡中，因为伊朗的保护伞将会消除任何对激进分子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明显，即使以色列对此不敏感，但是相对于伊斯兰国的成功，伊朗的核动力将会对本地区和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尽管伊斯兰国肆意虐杀严酷异常。

上面是分析类型的一个例子，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分析以便确定该地区的局势下可能发生的最危险的威胁。这也使得重点打击这些主要威胁成为可能，尽管我们了解到我们并不可能解决掉困扰着中东地区所有的问题。

以色列的重要性

在这场波涛汹涌的风暴中，以色列像一个毅然挺立的孤岛。以色列在这个巨大的广阔区域中（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印度）是唯一的国家，它既不是穆斯林国家也不是阿拉伯国家。此外，以色列是这个地区唯一一个基于开放型社会的民主国家，按照波普尔派的术语来讲。曾经人们也习惯称土耳其是一个民主政体，并希望可以看到接下来该国近期的的选举。最近有人说突尼斯是旧的和新的黑暗独裁统治的一线光明。然而，尽管突尼斯让人看到了些许希望，但还有待观察。当然，目前突尼斯还不是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典范。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它无法靠武力改变这一地区，即使它要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这也不会对更大的计划产生影响。巴以冲突甚至都不是分裂中东的因素之一。和平协议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说非常重要，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更广泛的影响了。

以上得出的一个警告是：以色列必须警惕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东变局的后果以及世界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出现与邻国合作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喜欢维持现状以及特别担心拥有伊朗拥核的国家。在这方面需要进行公开的合作方式，当然要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这一协议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因为任何阿拉伯领导人认为这本身是至关重要的，也不是因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特别感兴趣(他们肯定不是)。然而，没有人可以忽视阿拉伯街头，当然不是因为“阿拉伯之春”事件的发生。在街上，由于种种原因，巴勒斯坦人仍然构成一种象征；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巴以协议在这片地区的唯一的好处在于以色列提升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关系。

我们回想一下，几个重要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曾经在信奉美国。巴以协议签订后很可能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因素，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取代逐渐消失其能力的美国。如果这个设想实现，并且与阿拉伯国家展开合作，那么在签订协议后将要开展的进程将很有可能会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然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该地区基本问题没有一个会得到解决，甚至也不会受到任何旨在结束漫长的巴以冲突的相关协议的影响。

有协议或没有协议，以色列都不能漠视其边境或边境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位于大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中东地区常规军队的重要部分——自以色列建国一直以来威胁着该国——已经消失了(伊拉克)或严重受损了(叙利亚)。然而，其他来自动荡的中东地区的黑暗世界的武装力量现在正在以色列的边界建立起军事基地。在西奈半岛，有激进的萨拉菲主义者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加沙地带驻扎着穆斯林兄弟会， Hamas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不同武装派别。黎巴嫩有真主党，它由伊朗人建立。真主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恐怖组织，拥有先进的军事能力，超过 100000 个导弹和火箭，岸舰导弹，防空导弹，和 15000 多名武装和组织良好的武装人员，其中一些人还拥有在叙利亚战斗中的作战经验。叙利亚本身就很混乱，国家的部分地区由逊尼派团体掌控着，在某种程度上是激进的。伊斯兰国处在在最极端的边缘，奥巴马总统对该组织宣战。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力量得以维护执政多亏了伊朗的干预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士们(俄罗斯的援助悄无声息但很有效)。阿萨德依赖于真主党，所以他尽可能的援助该组织。他作为一座连接伊朗的桥，转手给真主党一些更先进的军事武器，除此之外，让该组织部署在戈兰高地，从而开辟了一条对付以色列的新战线。

因此，以色列几乎被拥有相当大的进攻能力的恐怖组织所包围。他们的进攻能力可能不如常规军队(真主党是个例外，因为考虑到它的火力)，但是因为恐怖组织的特点，我们知道从日常生活到真正的战争没有预先通知，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发生，而且也没有过多的准备时间(也就是说是一个突然袭击)，因此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色列将不得不与周围建立的越来越好的，发展的越来越强大的武装的非政府组织作斗争。当准备要与他们争战时，必须要考虑到整个中东的版图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崛起。这不太可能成为一种战场上布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并明确地击败了敌人。相反，这将是一个徒劳的挣扎，恐怖组织的战士被混在平民中，谁将成为恐怖主义支持者或对他们漠不关心，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将会使战斗变得复杂无比并干扰了以色列国防军(IDF)自由行动的能力。这种打败敌人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征服领土和并占领一段时间，就像 2002 年春天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做的那样。

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各种恐怖组织之间的许多差异，尽管事实上，各方视对方为敌人，甚至准备摧毁它，所有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们都认为伊斯兰教应该统治世界。他们之间的争论，有时甚至导致战斗，都是关于这一问题：什么是伊斯兰？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共同的基础和信仰，他们团结一致对以色列充满仇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准备淡化相互冲突，相互帮助来对抗以色列，同时在如何解释伊斯兰教的问题上保留其基本的分歧。因此，我们发现什叶派今天杀害叙利亚、伊拉克和俾路支省的逊尼派，同时建立逊尼派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为激进的哈马斯逊尼派组织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鉴于这种情况，阿拉伯语说：“我在反对我的哥哥，我哥哥和我都在反对我们的表哥，我们三个都在反对我们的邻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实用意义的假设。几乎所有人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和以色列，尽管他们相互厌恶，

他们准备到处互相杀害争权夺利。但当问题涉及到伊斯兰教之外的敌人时，他们联合起来的因素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因为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才是最终答案！”

无论以色列喜欢与否，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西方国家，因此该地区的大部分居民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与本国不相容的政治实体，它有殖民的特征，担任着“其他”外国的前哨阵地——敌意，自由，民主——世界。按照伊朗的术语：他们认为以色列是西方的长臂，并以美国为首，“小撒旦”代表“大撒旦”。此外，大多数以色列人想保持他们的方式，而不是想成为像他们的邻居那样，即使这个地方严格限制以色列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行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核心：如果以色列的力量降低，或者如果它失去了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那么它将被摧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它的敌人都使用二十一世纪的武器而它不会有一席之地，但战斗和杀戮都是根据七世纪的行为规则进行的。这还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和许多次战争才有可能复制现代欧洲的规则，或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中东不再有大的灾难发生。

最近，西方国家的一位已经退休了的领导人对我说，即使他不向他国内的公众解释，他们都明白以色列站在民主和现代世界对抗伊斯兰极端势力斗争的最前线的。这一观测是正确的，它具有实际意义。这对以色列的枕戈待旦非常重要，而这也不只为了自己。即使其他民主国家还没有准备承认这一点。

以色列同任何人达成和签署任何协议都将不会对在中东地区建立的世界有任何现实意义，除非以色列手中拥有防护和执行的权力。此外，伊斯兰武装力量的增加如伊斯兰国，或伊朗获得核武器，这些发展使得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的问题变得非常棘手。在这种情况下，机会大大增加，无论谁与以色列签署协议都必然不会是最终制定领土规则并能决定今后与以色列关系的特点的党派。甚至有可能，在穆斯林世界最激进的势力将会获取权力，因为他们已经在其他地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直接或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占领着这些地方，他们将会是确定与以色列的关系行为准则的人。

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了解到协议的签署国和担保人都没有权力阻止巴勒斯坦人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哈马斯在 2006 年赢得巴勒斯坦选举的大量支持，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该组织的力量已经削弱了。相反，显然它变得更强大了。即使阿布·马赞（国际上通常称呼他为阿巴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总理）的继任者是从他的支持者中选出的，没有人能保证巴勒斯坦政府足够强大并足以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浪潮，这可能导致出现一个比哈马斯还要极端的政府。在拉马拉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激进的政府，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大楼处于迫击炮射程范围内，巴协议中规定的安全措施将会极其的强硬。在奥斯陆协议这些问题并没有考虑到，这一过程导致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的领土中进入以色列并在 2002 年春天的一个月中谋杀了大约 122 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没有成功的改变这一情况，直到其夺回整个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公民权威留在了巴勒斯坦当局）。以色列必须要避免在未来再发生这样的错误。

虽然协议没有出现在，但以色列必将继续努力达成一项协议。然而这一目标达成，即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分歧不会消失，也很难换取以色列或另一方的妥协。巴勒斯坦的主要问题不是 1967 年被征服和以色列统治着的约旦河西岸，而是他们根本不接受 1947 年的联合国决议冲突后的结果。他们不接受以色列国的存在，即使是 1949 年停火后边界线。事实证明，“土地换和平”这一口号是一种假象。不仅仅是占领巴勒斯坦核心地区的领土而造成了冲突，而且因为在巴勒斯坦人视为他们的家园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与以色列国防军在希伯仑或纳布卢斯设置的路障相比，巴勒斯坦人发现以色列控制下的雅法，提比略，萨法德受到的压迫更多。

因此，首先巴勒斯坦人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即以色列将继续以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存在。至于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将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他们不会进入以色列。除此之外，在

中东大部分地区都普遍呈现出动荡和激进主义的背景下，虽然这一问题敏感而又困难，巴勒斯坦人必须明白确保以色列安全的这部分工作也得视以色列国防军在至关重要的地区的部署情况而定的，包括约旦河沿岸，在那的驻军必然会导致巴勒斯坦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真正隔绝。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以色列通过签署一项协议，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后，可能会发现它帮助建立一个危险的原教旨主义力量并且靠近以色列人口聚居中心，这一力量将会利用巴勒斯坦独立开展旨在破坏以色列的恐怖活动。去假设这个唯一的阿拉伯实体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民主政体，在以色列国附近开花结果，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一代或两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重改以色列的评估。然而今天，在中东当前的背景下，这些都是以色列存在的要求。如上所述，满足这些需求的协议，将不会缓解中东地区更广泛的冲突来源，但它将使以色列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发展良好的工作关系。

结论

基辛格写道，造成中东地区冲突的原因与十七世纪欧洲冲突的原因是相似的，并最终导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换句话说，中东的局面几乎与欧洲在 1648 年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冲突之前的局面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国家间关系体系，中东已经滞后于现代世界 350 多年。其意义不是科技上的，也不是多少年的问题，而是实质性和定性的。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欧洲的相关国家在肯定主权国家的基础上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体系，并从合法化宣战的因素中消除了宗教因素。

相比之下，中东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国家边界形同虚设，主权是没有意义的，太多的战争是由部落之间、教派之间以及宗教之间的摩擦引起的。事实上，宗教差异是最主要的，它对大部分地区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体系发挥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某些地方，非政府军事组织取代了国家。即使在国家内部管理上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强大的非政府组织保持着援助体系和不弱于国家的军队。这个过程并不新鲜，但它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表现出更强大的动力，主要是由于国家力量在阿拉伯社会削弱以及分裂力量在阿拉伯社会的增强。这种衰变只能导致中东偏离了通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样的成熟的政治进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欧洲从废墟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目前尚不清楚，何时何地何人是否可能导致中东出现一个类似的协议。

因此，鉴于当前混乱的统治，我们很难知道中东要朝向何方？正如教授约瑟夫·丹关于“混沌理论”以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大体上现象指出：“原因是存在的，但精确的影响却无法被预测，和在一个体系内只包含好几个原因，变化无穷的发展及其结果，使得无人能够精确地预测他们。”显然我们应该适度的评估该地区的未来发展。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导致当前现状各种因素的很好的以及详细的信息，但这些现象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将会发生什么。此外，外部干预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各种和各式各样的现象，这些现象如今还没有人思考过。

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斯兰国的袭击，以及什叶派民兵和美国在地上的务实合作，可能会导致逊尼派力量的联合，他们可能会将美国视为所有逊尼派的敌人，因为在复杂的穆斯林世界最古老的冲突中——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斗中美国偏袒一方。美国人放弃攻打巴沙尔·阿萨德却出来强烈反对伊斯兰国。然而事实是，阿萨德的阿拉维派杀死了成千上万的逊尼派并利用毒气对付他们，然而伊斯兰国的侵略却造成很少的人死亡。对很多逊尼派来说，美国人的行为似乎不合理也不公平。如果美国与伊朗或什叶派民兵组织合作共同对付伊斯兰国，那么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因为什叶派不仅把伊斯兰国的战士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而且把伊拉克的每一位逊尼派人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人。什叶派力量以这种方式在每个逊尼派聚居的地区采取行动。此外，逊尼派组织和国家无疑将会团结起来反对什叶派，不是因为喜欢伊斯兰国，而是出于对什叶派的憎恨。逊尼派遭迫害的情感可能会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使得激进的逊尼派组织受益如伊斯兰国——与美国的计划恰恰相反。此外，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行为可能导致更广泛的斗争，尽管今天许多逊尼派国家支持美国也被美国支持着。

这只是未来场景中可能出现的一个例子，但也并非不可能发生，最有可能没有考虑到的是决定何时攻击伊斯兰国，以便控制它的威胁。值得记住的是，我们见证了的近几年中东的进程，那些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中东地区在未来的世纪里其特征是不变的，几十年的长期斗争包括几个不同的冲突：激进的伊斯兰与西方民主的对抗，加上拥有大量穆斯林和不甚民主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对抗；每个区域所特有的可能爆发相互毁灭的冲突。也许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事件，看起来像是强大的力量之间对地区未来的斗争，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事件，接下来该地区将会从危机时刻过渡到一个更为乐观的时期？如果是这样，很显然，今天的事件则是邪恶的力量从该地区消失以前的最后一次较量，从此以后这里就会更自由，更稳定，更安全的地方。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不吸收发生在复杂的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很难搞清楚当前的形势。许多势力都被卷入其中：代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持续了数个世纪的紧张关系的武装力量；激进伊斯兰的力量，它想在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寻求自身的有利地位；同时忠诚于部落、宗教或是其他已经取代了效忠国家(可能已经完全消失或刚刚被大幅削弱)，试图维持对自己有利的现状政治力量则反对。

如上所述，在这个复杂冲突网络中，我们很难评估最终会发生什么。不过，只要有可能做出任何评价，主要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很遗憾的是很可能的其发展方向会更加悲观。

阿米德洛尔少将(已退休)，是“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JINSA's Gemunder 国防和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担任首相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以色列国防军军事学院的指挥官，以及以色列国防军情报研究部门的负责人。